

呂芳上主編，《春江水暖：三十年來兩岸近代史學交流的回顧與展望》

臺北：世界大同文創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6月

頁279-286

看見中國

張 力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不知從何時起，臺灣的一些人刻意以「中國」來對應「臺灣」，和過去以「大陸」、「臺灣」稱呼兩岸比較起來，前者似乎表現「一邊一國」的態度。除了這兩種對應的稱呼之外，運動與競技場上則是以「中國」對應「中華臺北」，這一國際認可的稱呼已經行之有年，不管滿不滿意或接不接受，現階段也只能「維持現狀」吧。

「看見中國」有兩種涵義，一是來自臺灣的人到了大陸，看到歷史、地理課本中描述的中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現況；一是大陸的朋友到臺灣後發現濃厚的文化中國，就如同韓寒在《太平洋的風》一文所說，他感謝香港和臺灣「庇護了中華的文化，把這個民族美好的習性留了下來，讓很多根子裡的東西免於浩劫。」我生長在臺灣，談的是前者的感想，後者則是由大陸的朋友來發揮。

一、聽見大陸

生長在反共抗俄教育的時代，居住在幾乎全為外省移民的南臺灣眷村之中，對於海峽對岸的熟悉程度可能比較高些。父輩的一代經常談起1949年以前，在大陸的生活經驗和所見所聞，偶爾也會和臺灣的情況做個比較。但我們漸漸發現，對於大陸的美好記憶，停格在1949年。1949年以後的大陸情況，我們得到的訊息都是負面的，包括殘暴的政權和苦難中的同胞，此一論述在那個時代不容懷疑。

政府如此宣傳，也盡可能防止人民從別的管道獲取訊息。然而高雄縣市有陸海空三軍的主要基地，對岸自然不會放過，他們經由短波提供了另一種說法。政府嚴

格禁止民眾收聽「匪臺」廣播，有人說政府派出巡邏車，能夠偵測到竊聽的電波，但我的經驗是自己不說出去，憲警不會知道的。我的一位中學同學無意間收聽到對岸廣播，竟然很誠實地在週記本上記下了「大陸軍樂很雄壯」、「大陸的青年節是五月四日，和我們不一樣」，結果引發導師和教官的關切與追查，這位同學度過幾天茫然與忐忑的日子，最後總算沒事。

那是大陸文化大革命的前期，每一首短波飄來的革命歌曲都很雄壯，我就在這樣的環境中聽見了大陸，每天傍晚六點福建前線廣播電臺開始放「東方紅」，接著是新聞報導，內容我不熟悉，也就沒有甚麼深刻印象。「大海航行靠舵手」經常出現，旋律簡單動聽，我就默默地學會了，但是隔了十多年才發現歌詞裡有幾個字，我的解讀有誤。有的時候節目主持人會痛批政治上敵對的組織，聽得我一頭霧水。不知道節目製作人有沒有想過，這樣的內容對海峽此岸的竊聽者太深奧了？此外，每天的廣播中都有鼓動「起義」的內容，主要針對空軍，每種機型重賞黃金若干兩。對我而言，這些內容只是增加我對己方軍機的一點知識。

收聽大陸廣播也讓我對己方如何向大陸廣播產生興趣，我最常聽的是「空軍之聲在臺灣發音」，有百聽不厭的空軍軍歌，也有以馬思聰「思鄉曲」為片頭曲，配合女生朗誦「我站在馬山的前哨，望著那一衣帶水的故鄉」，但節目內容我不記得了。鼓動對岸空軍起義的喊話自然也有，一開始先說「離地三尺，就有自由」，接著介紹飛行路線，遇上我機如何擺動機翼，表現投誠之意。之後也是一連串機型與獎賞黃金數目。這一段敘述比較長些，我想大陸的軍機種類果然比較多。還有兩個頗為有趣的節目，一個是「三家村夜話」，由三位播音員分別飾演大陸高幹，講一些高層之間不可告人的秘密，其中出現最多的人物是田家英，其次是江青，顯然這是散布謠言分化敵人的方法。另一個是透過廣播聯繫我方敵後工作人員，並傳達上級指示。播音員念的都是一連串四個數字的電報碼，顯然是不欲敵方破解。但我一直懷疑這樣的傳達方式，究竟是真是假？

有人說那是白色恐怖的時代，閱讀身陷「匪區」作家的作品，若是查到了，就會被戴上紅帽子，這也是實情。不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中文系的學生還是可以從作者名為「魚凡」的書裡讀到了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而《中國文學發展史》其實就是《中國文學發達史》。音樂方面似乎寬鬆些，劉雪庵譜曲的許多歌曲都是中小學音樂課本上必定教唱的，海軍與空軍官兵每天晚點名唱的軍歌，也是他譜曲，但他一直留在大陸。周璇也仍在上海，但她的歌曲已經成為臺灣的歷史記憶之一。中華商場有一家女王唱片行，發行了不少1949年以後大陸的京戲和樂曲，如

「三門峽隨想曲」，聽說老闆吃了牢飯，唱片倒還是可以賣。

我在大學快畢業時，逐漸遠離西洋歌曲，對中國人的創作有了興趣。有一次借來一捲錄音帶轉錄，A面是「黃河鋼琴協奏曲」，反面則是「梁山伯與祝英台小提琴協奏曲」，這捲磁帶我聽了不下數百遍，好像對每一個音符都很熟悉了，也收集了樂曲和音樂家背景的相關資料。這些當時不能公開播放的樂曲，倒是在一些唱片行中找到。1982年冬天，第一位演奏梁祝的小提琴家俞麗拿到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演奏此曲，並與聽眾交流，我趕去聽了後半場。2010年5月23日她在臺北中山堂登臺演奏，音樂會結束後，我排著隊請她在《永遠的祝英台——紀實俞麗拿》一書上簽名，滿足了一個粉絲的期望。

二、初見大陸

兩岸嚴峻對峙的年代，國軍駐守海峽之中接近大陸的島嶼，那是當然的前線。金門列島面對廈門，馬祖列島則在閩江口外，雙方時有砲擊。金門的馬山設有面向對岸的播音站和瞭望哨，報紙上不時出現蔣總統或政府高級官員，以及各國外賓，來到馬山以望遠鏡觀察對岸的報導。我不清楚那是意謂著大陸的一舉一動都在我們掌握之中，還是對某些人來說，解了思鄉之苦。我的一位大學同班同學服預備軍官役是步兵少尉，抽籤分發馬祖當排長。年底我收到他從前線寄來的賀年卡，信中不免有些駐防前線的感慨。於是我假設他的心情，寫了一首題名「寄征人」的詩寄給他，第一段是這樣的：

子夜曾去查哨，你說
有一些漁火在遠方飄蕩
啜飲一口野戰夾克裡的高粱
破曉時分，萬里河山憂鬱地捲來

他幾乎每天有機會眺望大陸河山，也許會有這樣的心情吧。當然，這都是我一廂情願的揣測。

我沒到金門和馬祖，當然就沒有機會在馬山望著大陸，或在閩江口外遐想。事實上服兵役的時候，自己還以為沒有抽到「金馬獎」的籤感到慶幸。直到1987年我才第一次看到大陸。

1987年夏天我第一次到香港，除了隨處看看大英帝國治下的港九兩地，我早就

從余光中和劉紹銘的文章中知道九龍北端的落馬洲，可以眺望大陸。我搭港九鐵路到上水站換巴士，車行半個小時後下車，四野無人，路旁一條小路通向樹林。進到林內，首先看到竟是英國軍營及荷槍實彈的英國士兵，再行不久，就有幾處瞭望臺，架有遠鏡，可以瞭望深圳河對岸的深圳。我從相機的望遠鏡頭中仔細端詳了改革開放之後發展了十年的深圳，高樓大廈林立，一片嶄新氣象。落馬洲這一頭倒是十足鄉野的邊境景象，我不免憶起1961年前後，從大陸湧出的難民，就在對岸伺機渡過深圳河。

這次香港行還抽空去了澳門，當地的景點之一是到拱北海關一遊。但在那裏我們只是和門口的警衛閒聊幾句，照幾張像，看不到門內的大陸。不過我卻看見一輛掛著「粵」字車牌的貨車，自門內駛出。該車駕駛座雖然在左，卻立刻入境問俗，行駛道路左側，展現了高超的技術。

三、走進大陸

老實說，我搭的港九直通車進入大陸，首次踏上的大陸土地是廣州火車站的月臺。

從香港回到臺北的第二年，我就打算找機會進大陸看看。1988年政府已開放老兵探親，其他身分的人能不能去大陸，我們並不清楚。1987年9月《自立晚報》的記者徐璐、李永得以秘密行動成功登陸，媒體大肆報導，政府原本要處罰報社，後來不了了之。因此政府到底准不准我們赴大陸，誰都不知道。

1988年我到香港參加「紀念羅香林逝世十周年學術研討會」，正好一位與會的民間學者要去大陸走幾個地方，聽我有此計畫，就邀我同行。我隨即答應，兩人就到旺角的中國旅行社辦好臺胞證，買了港九直通車車票。會議結束後，就在紅磡車站搭乘直通車北上，當時的心情跟重訪故鄉的老兵一樣，充滿著不確定，但更多的是好奇。我的時間有限，不能隨著友人跑好幾個地方，於是就選擇一個城市待上兩、三天，對大陸有一些初體驗即可。直通車的終點站廣州是座大城，但不夠內陸，而且也是廣東話的生活圈，彷彿和香港差不多。我選擇京廣線北上一班夜車在第二天清晨可到的大城，於是就在人潮洶湧的廣州站買了兩張到長沙的黃牛票，和兩位返鄉探親的老兵同宿一間軟臥車廂，走上了近代史上的粵漢鐵路。

長沙是歷史名城，我首次到訪，展開各式各樣的初體驗，也立刻瞭解用外匯券可以多換一些人民幣。我憑著一張旅遊地圖，搭乘公車看幾個景點。首先是嶽麓山的湖南大學和嶽麓書院，登山經過愛晚亭，山上有黃興墓，不過旁邊的樹林內卻散

落著斷裂的陳天華、禹之謨等革命黨人的墓碑。市區內則去了第一師範，趁著門口警衛打瞌睡，我進了校園，看到幾處與青年毛澤東有關的史蹟。我在地圖上又看到「雅禮中學」的地名，這所學校和我當時的研究稍有關連，不過到了該校，一位老先生告訴原來校址在湖南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內，我再搭車前往，果然看到幾棟老建築，就自我想像這裡就是1930年前後的雅禮學校吧。

憑著一張售價人民幣兩角的《1987年版長沙旅遊交通圖》，讓我的史蹟之旅頗有收穫。大陸幾乎每個城市都有旅遊地圖，通常一下火車或長途汽車，就有人前來兜售。地圖上密密麻麻的文字，需要花一點時間才能弄明白自己的位置，以及如何安排造訪的地點。然而地圖上看似近在咫尺，實際行路總是頗有一段距離，那是因為旅遊圖只是現地的濃縮。從那時起，凡到大陸一個城市，必定先買旅遊圖，要是沒有機會買到地圖，就會覺得自己不踏實，不知身在何處。

三天之後我從長沙搭夜車回到廣州，在珠江邊上的華僑大廈住了一晚。大廈面對著海珠橋，1949年年底共軍攻入廣州城，國軍於撤退時炸毀了這座橋。此橋早已重建，自行車騎士得把車子抬上橋上的專用道。我在廣州僅停留一日，仍是憑著一張1988年印刷、售價人民幣四角的《廣州市交通遊覽圖》，憑弔了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及十九路軍紀念碑，也在越秀山公園鎮海樓的廣州博物館，見識到了鴉片戰爭時期清兵的武器和裝備。

自此以後，每一次的大陸之行，總是設法尋訪古蹟，親臨歷史事件發生的現場，彷彿可以做一印證。然而這種印證也不一定是真實的，事過境遷，加上天災與人禍的破壞，或是新的地標取代了歷史記憶殘破的遺物，有些時候，大概只能憑著自己的想像了。

1989年7月至8月間，我與近史所三位同仁在毫無違法顧慮下進入大陸。這次旅行有些學術交流的安排，我們參觀了上海檔案館，拜訪了復旦大學歷史系，接待我們的黃美真教授告訴我們到南京時，可以參觀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到南京後，由於我們並未事先申請進入二史館，門口的解放軍很盡忠職守地不准我們進去。我們才想起黃美真教授曾寫下萬仁元副館長的大名，我們請警衛幫忙聯繫，不久來了一位年輕人，代表萬館長約我們第二天來訪。次日，在萬館長親自接待下，我們有機會參觀二史館的檔案庫，看到當年國民黨黨史會留下的庫房設備，仍然堅固耐用。萬館長真是一位和藹親切的學者。

四、交流漫談

所謂交流，包括的範圍極廣，即使是學術交流，也不限於一端。以下謹就個人經歷的活動，談談自己的經驗與感想。

(一) 學術出版品

1980年代中期，大陸出版品在臺灣是當然的禁書，圖書館中若是收藏，總會另外闢室特藏，近史所圖書館特藏室裡的每一本書都蓋上「限制閱讀」的圖章，研究人員才能複印，但是每頁還要蓋上「匪偽書刊，禁止傳布」的圖章。個人擁有簡體字的書，是多麼稀罕與危險的事。但是熟悉門路的讀者還是可以從特定的書店買到「匪書」，這類書店的負責人冒著被扣上「為匪宣傳」罪名的危險，坐著殺頭的生意。風險高的行業，利潤也高，謀取暴利者甚至把人民幣定價的書籍改為美元計價，這也該算是發國難財吧。

到了大陸，逛書店是必要行程之一，且到每個城市，都要到大型的書店看看，而它們的都叫新華書店。1990年前後的書店經營方式還相當落伍，書店裡分成多個封閉的小區域，以玻璃櫥櫃隔開讀者與店員，店員身後書架書，讀者不能直接拿取，需要告訴店員，甚至指出位置，店員才不甘不願地拿出書來，且生怕讀者弄壞了，盯著讀者的一舉一動。買了書，先取小票，到櫃檯結帳，之後憑蓋了章的收據回來取書。書要是多些，就用一條細塑膠繩綑紮，不甚牢靠，走著走著書就散了。

在臺灣錢淹腳目的年代，大陸的出版品又是如此便宜，為了節省時間，購書也就不會精挑細選，只要有興趣，或與自己的研究稍有關聯，就立刻取書結帳，並在最短時間內送到郵局，寄回臺灣。為了爭取寄書過程的流暢，不給郵務人員帶來麻煩，有好幾年我甚至自備包書紙、塑膠繩、膠水、奇異筆，若還有一兩位同伴，大家分工，幾十公斤的書很快就能包紮好。

如今再去大陸，仍是會抽空逛書店。各地具有一定規模的書店以懂得以客為尊的道理，硬體的空間規劃與軟體的服務態度，都有很大的進步。甚至一些很有特色的書店，如南京的先鋒書店和重慶的西西弗書店，顧客更像是去閱讀，而不只是單純的購書。然而，我已不能再像以前一樣瘋狂購書寄書，因為書價漲了，家裡的空間少了，看到一本有興趣的書本時，開始會左思右想該不該買。我想起1989年8月初我們在北京王府井新華書店購書，結帳之後發現停在門口廣場的自行車被警察扣住，我們繳交一元罰款，但決定稍後取車，再進書店，因為讓警察繼續幫我們看好

車子。警察也同意，不過他問了一句：「買那麼多書，你們看得完嗎？」這真是難以回答的問題，過去買的書，近幾年來各方好友的贈書，真該抽出時間好好拜讀。

（二）查閱檔案資料

臺灣研究民國史的學者或學生，有一些常去大陸的中央或地方檔案館、圖書館調閱資料，這方面我的經驗有限。1990年我首次嘗試到西安的陝西省檔案館讀檔，此舉大概讓館內人員嚇了一跳，雖然我手持省社科院的介紹信，還是拒絕了我的申請。接著幾天我在陝西省圖書館的解放前出版品閱覽室閱讀報紙期刊，顯然很少人利用這間閱覽室，因此我的到來，讓圖書館人員增加了份內的工作。我不知道該不該向她道歉。

到了1998年，我才兩度到南京二史館調閱外交部和全國經濟委員會檔案，由於我已很確定尋找資料的方向，無須複印，盡量抄錄，之後繳交各項規費，也都很順利。

1990年代中期以後，臺北各檔案機構加快開放檔案的腳步，使用起來也相當方面，因此我為自己訂下一個原則，要先掌握臺灣典藏的資料，如確實有必要，再安排時間赴大陸調閱。實際上我總是有著不確定感，會不會像許多大陸學者提到的經驗一樣，受到檔案館的刁難。臺灣自2000年以後，政府部門的檔案管理局成為此後唯一典藏政府文件的中心，然而這一機構卻不對大陸的學者學生開放，理由是臺灣的學者學生在大陸申請調閱檔案，屢有挫折，回來之後向民意代表反應，檔案管理局就以雙方未能互惠為理由，暫不考慮接受大陸人士的申請調閱檔案。這是兩岸學術交流之中的憾事，恐怕一時之間也難以解決。

（三）參會與講學

參加大陸學術機構舉辦的會議，主要取決於自己時間的安排，也可能因為對會議主題感到興趣，或是會後參訪行程特別吸引人，而參加會議也是與友人晤面，結交新朋友的機會。會議的性質不同，進行的方式也不同，但是無可諱言，民國史相關的研討會在大陸越來越多，議題也更為多樣，也時常出現一些激烈的爭辯，參加這樣的學術會議，自己收穫亦多。

講學主要是在大學校園裡，面對師生，介紹自己的研究或臺灣的學術資源。一般而言，近代史專業的聽眾對學術資源的分布與利用特別注意，近幾年來臺灣完成的數位化成果，可以提供遠距上網閱覽，也些學生聽完介紹之後，就立即上網申請

帳號。更多的學生則是對臺灣的現況有興趣，兩岸推動交換生互訪之後，有時聽眾之中也有曾經訪問過臺灣的陸生與來自臺灣的交換生，可以使得經驗的交流更為豐富。

報告自己的研究雖然得心應手，卻不一定是多數聽眾熟悉的議題。有一次我在杭州師範大學簡單介紹了自己的海軍史研究，會後一位黃老師告訴我，他的父親曾是抗戰時期的留英海軍軍官，也是我知道的名字。於是在我的鼓動之下，黃老師花了幾年的時間，為他父親完成了口述歷史，留下了頗為珍貴的青島海軍資料。這是意料之外的收穫。

（四）學生交流

2003年10月中旬，我以隨團老師的身份，陪同來自臺灣各校的歷史研究所研究生到武漢，參加華中師範大學承辦的兩岸三地歷史學研究生研討會，這是最近辭世的胡春惠教授大力推動，研究近代史的年輕學者之間的交流活動。2008年暑期，我當時任教的東華大學歷史系與臺北大學、東海大學兩校歷史系合作，承辦兩岸歷史系本科生的交流活動。來自武漢華中師大、長沙湖南師大、成都四川大學的18位師生與臺灣三所大學，共同上課與參觀數日。現在想來，研究生的研討會比較有專業上的共同關注點，且不少論文發表人陸續在學界嶄露頭角，則彼此之間的進一步聯繫，應該會更密切些。

我曾想過，父輩的一代曾在戰場上相互敵對，拚個你死我活。我之一代受不同意識形態教育長大，仍然抱著戒心，但歷史學的訓練可以使我們比較容易擺脫束縛。有了開放與交流的機會，除了可以讓自己更加認識對方，也應該為下一代的交流開創更多的機會。但是，這是不是一件更艱鉅的工作呢？